

9 787543 653740 >

天下良友

臧杰著



一本画报里的人生“传奇”



青岛出版社



天良夜

臧杰著

青島出版社

「我說話又得罪人」

臧杰著



卷之二十一

THE YOUNG COMPAN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良友: 闲话文库 / 臧杰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36-5374-0

I. 天… II. 臧… III. 编辑—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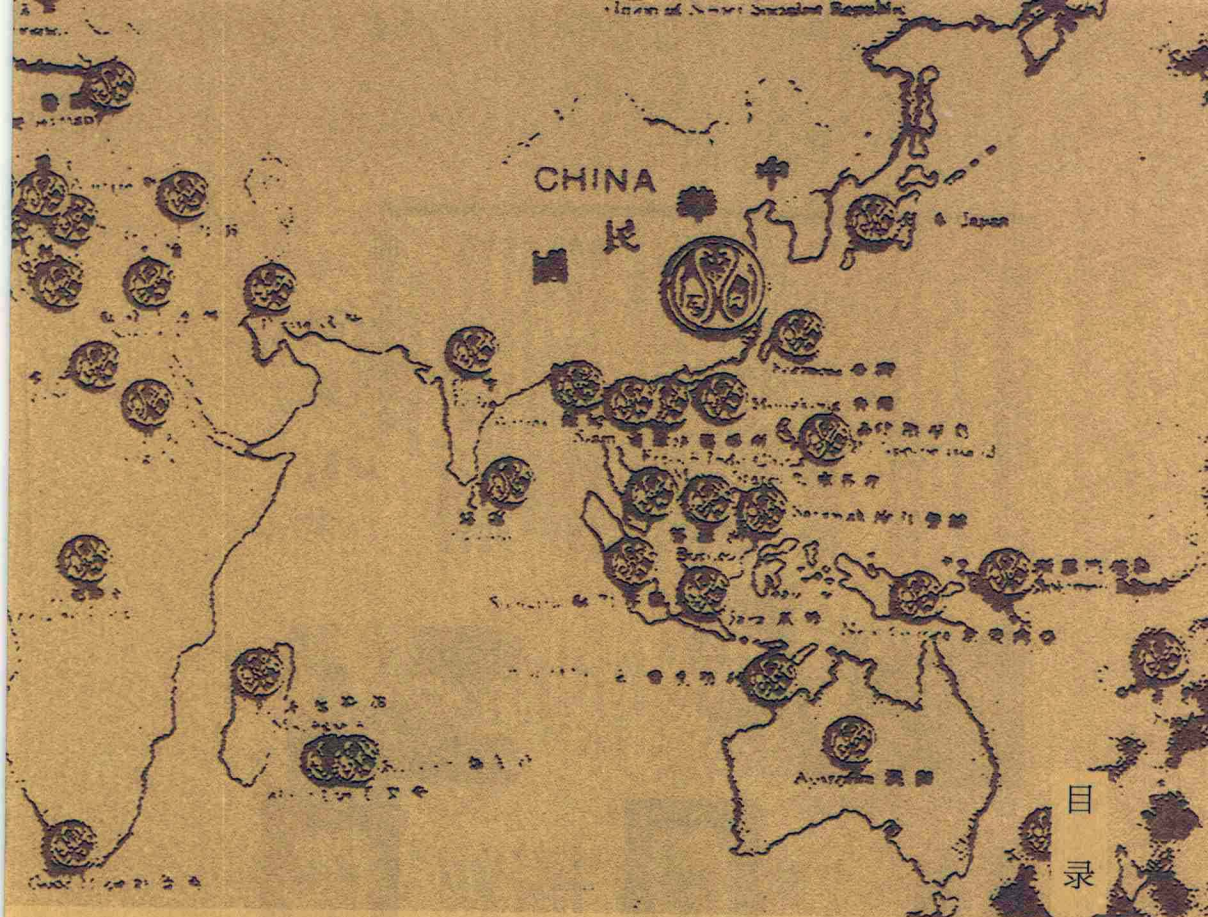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58462 号

书 名 天下良友
编 著 者 臧 杰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经 销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 咏
特约编辑 贺中原
装帧设计 良友书装·李欣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24开(889mm×1194mm)
印 张 8.5
字 数 140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5374-0
定 价 2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目 录

引言

【第一至四期主编】

伍联德：『出版育民，印刷富国』

【第五至十二期主编】

周瘦鹃：『紫兰花片』骤然凋零

【第十三至七十九期主编】

梁得所：『造梦者』的痛与死

【第八十至一三八期主编】

马国亮：半生创造，半生『留恋』

【第一三九至一七一一期；第一七二期主编】

张沅恒张沅吉：在炮火和抉择中『喘息』

赵家璧：守候者的书香年华

郑伯奇和孙师毅：革命『注射器』

余汉生的『脑袋』与『口袋』

陈炳洪与袁仰安：最后的『巨头』

伍福强：把梦留在香江

附录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大事记

后记

引言

最近两年，有关《良友》画报的研究可谓此起彼伏，其势头让人想起几年前的“鸳蝴”正名“风暴”——以范伯群为代表的一干学人试图将“鸳鸯蝴蝶派”拉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史”。

有关文学史的改写，自“海外汉学”的引入后，就像被吹皱的一池春水，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将沈从文与张爱玲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使这二位至少堪比“鲁郭茅、巴老曹”了。

为“人生”、为“民族”、为“革命”的写作“指针”考量，开始向文学本身和市场复归，这是“太平盛世”的必然结果。这也使得今天70后、80后、90后的钟情于情爱与玄幻的写作，怎么看都有些当年“鸳蝴”小说和“神怪”电影的味道，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是写作技术与出版传播手段罢了。

而今，有关市场和传媒本身价值的“认证标准”也开始向传媒研究迈进了，这种考察与研究的姿态局于著述数量本身和研究群体大小，虽然没有现代文学研究来得红火与细致，但“味道”和“方法”还是大致不二的，加上以陈思和、许纪霖、桑兵等文学研究界、思想史研究界、历史研究界的学术精英率领“子弟兵们”的跨界“围剿”，李欧梵、村井宽志、金秀妍等“海外汉学”势力的“东征西战”，使今天的传媒研究本身变得含混不清，同时也因为新方法和新观点的注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点血脉贲张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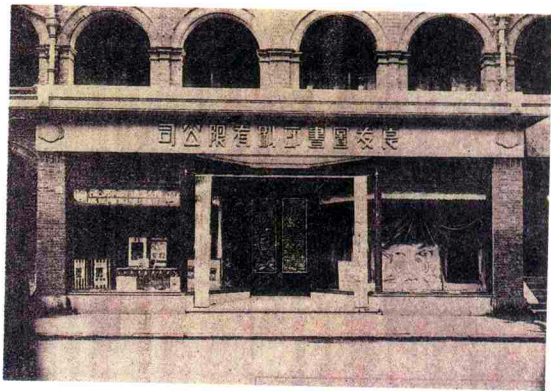
2001年，王建辉在“清点”出版研究的路数时，还把这类研究分解为书史、图书情报学，思想文化史，以及学院与实践打通派“三路”^{〔1〕}，但如今看来，随着研究对传媒文本的细读与对传媒价值的还原和重估，研究结果指向越来越统一，都开始向知识分子的“身体”、“灵魂”、“自我实现”、“价值取向”、“时代与文明症候”上靠拢，包括“书业竞争”这样属于“行业问题”的领域，也在“文人交往”、“社会网络”、“经营姿态”等诸多还原下，变得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领地了。

这种“注入”或者说是“颠覆”，使原来新闻出版研究界的队伍自身也开始自醒与求变，有关《良友》画报，曾经主导《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撰的方汉奇，在“经典”新闻史中，只给了如下几句评述：综合性画报以《良友》为代表，内容广泛，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良友”的贡献，一是出版了多种以抗日为主题的画册，建树殊多，并于1931年底编印《甲午中日战争摄影集》，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暴行披露于国人面前，用历史启迪国人，激励全民的抗日热情；二是1934年出版的《中华景象》一书，系统介绍中国二十四省区的情况，是中国空前的图画巨著。^{〔2〕}而在他为其博士生吴果中写的《〈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则写道：“我们之所以选择《良友》与‘上海都市文化’作为研究的主题，是因为《良友》是现代都市文化的衍生物，同时也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载体，她诞生于上海都市文化的土壤和氛围之中，又为上海都市文化的孕育、繁衍、滋生、汇聚、弘扬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3〕}

这显然不是一种认知的“修复”，而是一种历史书写观的“改正”。这也让人想起有关“新文学史”书写的一些指摘——“1939年李何林撰写他的现代文学史时，沿用并修改了《大系》（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赵家璧主编的《新文学大系》）在文学分期上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并帮助巩固了左翼在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支配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来建立一种政治上正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4〕}

有关《良友》画报的历史地位评述，早期中国画报研究当中就有两篇非常著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公司



名的文章，一篇是萨空了的《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另一篇是阿英的《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均对《良友》称赞有加。萨空了赞赏的是《良友》的印刷，称用影写凹版正式用以印画报者，“则始于《良友》”，并述及《良友》自创刊以铜版二十四页而畅销，至第45期改为影写凹版，第50期增至四十二页，成为“中国印刷最精美之画报”；^[51]阿英的文章刊发在第150期《良友》上，称《良友》体现了中国画报内容的高度进展，不仅强调了军事、政治、经济、建设，以及国际的重要动态，还旁及于一般的社会生活，艺术文化。

这两篇文字比及1987年开始编撰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早近四十年，看起来似乎更为热情洋溢，所谓观念决定笔触，《通史》与文学史观中“政治上正确”具有高质的一致性。这也为“重构”积累了前提。

但在当下这种重构当中，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存在呢？是不是就有限度呢？也未必。

许纪霖在他主导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中，清理了知识分子研究的方向，他认为旧框架下的研究，有两个向度：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

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而新框架的研究已经从都市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空间。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6〕}

陈思和在在其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也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公共活动空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就是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但他也认为，这不一定是唯一的模式，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栢社也可以诗会雅集的方式，在民族危亡之际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而“同仁刊物”为核心的作者阵营和无明确结社意识的社会小团体，也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有了社团的意义。^{〔7〕}

上述论述可以提供的一种支持是，《良友》画报无论从公共空间考量，还是从以刊物为核心的著作编辑群体上考量，都体现了一种生产社会公共舆论，体现政治批判功能的能力。

但这种归于精英化的建构与区隔能不能广泛适用于中小知识分子，存不存在着一种世俗层面和理想层面合二为一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可能呢？

在当代传媒出版领域，流传着办报有“三种人”的说法，即所谓政治家办报、文人（学者）办报、商人办报。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于前者的强调是所谓的立业原则。

而这与中国近现代传媒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些共通性的，“在民国初年的主要媒体新闻报纸，基本上党办报纸，背后都有着政治力量的操纵来发挥其喉舌作用”。陈思和认为，这正是知识分子刚刚从士大夫阶级分化出来的政治表现，这样的办报传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灵魂，也是傅斯年在20世纪40年代建议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缘故。^{〔8〕}

但现代报业的发生与发展，在二三十年代，对于民营资本的依赖已经越演越烈，传媒的舆论属性和资本运作属性，是多种团体在介入传媒领域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文人学者可以通过媒体传达自己的趣味，革命者可以通过媒体张扬理想和革命吁求。但花的钱，不是自己的，就是民族资本家或者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能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才是最高境界的“美妙”。

在制造这种“美妙”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复杂性，它也包涵并导致了传媒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双重分裂，资本要追求价值，在资本中耕耘的知识分子也要追寻价值，但这两种价值往往对立存在，所以妥协和不妥协的分分合合，就构成了传媒资本与知识分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而在此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些理论，恰恰是因为想借此厘清有关《良友》画报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身上潜藏的认知丰富性与复杂性。

比及精英群体的建构，《良友》画报与“良友”公司的创办群体应该是一个“次精英”群体，同时也是一个与商业媾和的群体。

这个群体当中的人物，并非没有理想建构，伍联德在第25期《良友》当中就提出了“以出版业保国育民，以印刷业富国强民”的使命。但不得不说的是，尽可能追求商业的成功，是这家以“同乡”资本为集结方式并付诸经营的公司的基本目标。

在这一前提下，人员的组织架构与内部交往，各色人等的来来走走，包括核心团队的瓦解与重组，都在一个商业故事的起承转合中，暗暗地进行着。

而这个“小资本家”与“小知识分子”聚合群体，他们当中所有核心人物在出走之后，都无法使他们进入真正的精英群体——高校与政界。唯一两个“成名”后进入的人物，周瘦鹃与郑伯奇，一个被提前解聘，一个在与经理大吵一顿后拂袖而去。在该群体当中，创建品牌的伍联德在内讧中被迫退出后，只在一家买办主办的报纸（张似旭代美商办的《大美画报》）当过九期主编；而“三巨头”之一的余汉生却被上海大律师袁仰安在香港宣布对《良友》“停权”；另一巨头“陈炳洪”在公司由粤商结构转化为江浙商人结构后，干了三年名不符实的“总经理”，当日



Chu Ying,
the Nation



生學國中
Chinese students of



結婚士女瑞麗陳與君號家趙輯編『生學國中』版出司公本

本人“打进”租界并因画报宣传抗日而有了半天遭遇羁押的经历之后，就迅速离开了那个是非非、战火笼罩、鱼龙混杂的上海。

《良友》画报的两大“支柱”并携手将其推入辉煌期的主编——梁得所和马国亮，梁得所因“股权”和“保姆身份”而贸然出走，结果在办了一家并不成功的出版社，出了五种质量上乘但效益不佳的刊物后，英年早逝于广东老家；马国亮因为不满于利益群体对“良友”的瓜分，在不介入不支持某一派系的情况下，在香港主办了几期《大地》画报，但后来的流离失所与无奈“改行”，都意味着他仅仅被定格在一个“编辑”的身份上，写作绘画他都能“上手”，却都难以闻名。在回归祖国后，更是在政治风暴中被雨打风吹去。

即使在“良友”当中创造了《新文学大系》和“良友文学丛书”系列“佳构”的赵家璧，也在“良友”因“八一三”事变宣布“破产”后，仅仅在一所叫“光实”的中学谋了个教职，可怜的收入还不够养活自松江而来的一家老小。如果没有老舍在抗战后让他重归出版行业，他的命运必将被改写。相比较而言，赵家璧是“良友”诸核心编辑当中将“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做得最到位的一位，也是将个人价值和理想追求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位，因此他晚年的成就和地位，也被定格为出版精英和编辑家，而与他同年的马国亮及早逝的梁得所自然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如上描述，似乎与《良友》画报的辉煌与成就极不“对称”，似乎不应该是这家“最高发行量达四万份，代售处遍及全世界，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范围最广、发行数量最大、报道信息最及时、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大型的综合性新闻画报”（方汉奇2007年评价）里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应有的命运，但事实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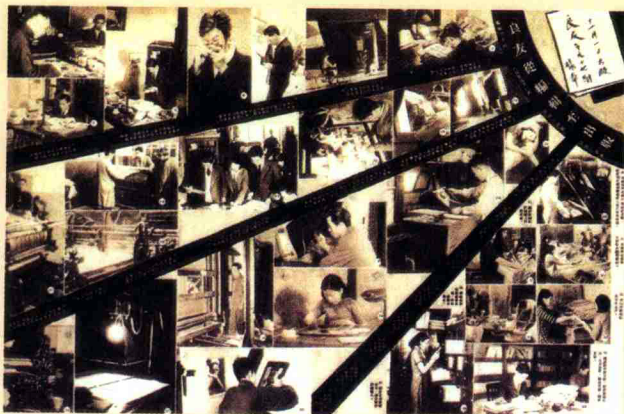
留學部啓

街九二至九

美的專門藝
本院爲發揚
九。打破退化
談捷徑。全
務使社會
八。藝術之真
既。保證短
生。均能使
備有成績與
力。

馬到功成

畫法



◎《良友》画报从编辑到出版的流程图



◎《良友》画报编辑团队

不唯如此，《良友》画报在都市空间和现代化建构、消费文化营造上的“贡献”与其“自我殖民”色彩之间的关系辨析也值得考量。

从根本上说，《良友》画报在创立之初，虽然得益于拷贝与抄袭《伦敦新闻画报》，但其胎记还是“鸳鸯蝴蝶派”以及“小报”盛行影响下的产物。这一点，当年沈从文是很看得出来的，他说：“承继《礼拜六》，能制礼拜六派死命的，使上海一部分学生把趣味掉到另一方向的，是如像‘良友’一流的人物。这种人分类应当在‘新海派’。他们说爱情，文学，电影以及其他，制造上海的口胃，是礼拜六派的革命者。帮助他们这运动的是基督教所属的学生，是上帝的子弟，是美国生活的模仿者，作进攻礼拜六运动而仍然继续礼拜六趣味发展的有《良友》一类杂志。”^{【9】}

确如沈从文所说，《良友》的创办者伍联德，以及后来核心人物余汉生、陈炳洪，都出自“岭南大学”，其前身格致书院是188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哈巴与香便文两牧师发起创办的。而给《良友》画报带来本质上改观的角色，也是深受

基督教“浸礼”的人物——梁得所和马国亮。梁得所和马国亮早年在广东培英教会学校^[10]的学习经历，是其传统胎记消弥的根本基因；而常常流连于福州路西文书店的赵家璧，尽管曾经说他的“看重”西典是源于徐志摩的“教诲”，但拷贝自“蓝皮小丛书”的“一角丛书”和由之演变而来的“良友文学丛书”，乃至直接挪用的“大系”称谓，以西方的文类形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史料）分类的《新文学大系》又何尝不是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又何尝不是“自我殖民”的规划？

更进一步的例子是，1926年11月，伍联德在历访新加坡、檳城和吉隆坡等英属东南亚华侨圈，考察完南洋电影界并访问了陈嘉庚之后，回来就提前四个月与旧式文人周瘦鹃解除了“聘约”；而有在美国留学经历、曾经参观过好莱坞的陈炳洪从郑伯奇手中接过《电影画报》后，马上就把它变成了好莱坞影迷读物，与郑伯奇宣传国片的立意彻底背道而驰。如此选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改造或创造？

如此繁杂的事实线索，在公共空间的营造与对位当中，反诸于“良友”及《良友》画报，是怎样一种概念？除却了“政治家”和“文人学者”，如何去理解带有精英抱负的“商人”，或者说有“商人”特征的传媒“次精英”？

叶文心说，谈中国现代的都市，不能不谈在中国文化之中对商业以及商人行为属性的看法。“商在近现代的过程里成为一个专业，它本身是一个知识体系，本身自称有文化。它不但有文化，而且它掌握了教育的机制。商学、商业学校、实业救国、经济系等成为一整套之后，它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可以跟士大夫的文化相抗衡。”^[11]

余英时也曾反复强调过自晚明以来绅士与商人的合流，他认为“商人恰好置身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榫之处”。一些幼有大志的商人具有超越性的“创业”动机。他们同样重视自己的“名”、“德”或“功业”。^[12]

这也就是说，有关商业、文化、政治及公共空间的同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藕断丝连、相互牵制与依存的存在。

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应该说《良友》画报所体现的正是在商业基础上建立

起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像商品一样，像朋友一样，像伴侣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给人以文化上的当头棒喝，不在于取消蒙昧，但未必妨碍它具有启蒙作用，未必妨碍它成为营构公共空间的要件，也未必妨碍它被定格为出版史或者画报史上的“明珠”。

基于这个立场，本文由此而下的还原与解读，都或多或少地与商业文化同构中的人际脉络和利益关系有关，其评述方式也在回到事件和当事人本身的同时，必然地“携带”了无法抑制的“想象”、“探询”和“体味”的色彩。



【1】参见王建辉：《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4页

【2】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516页

【3】方汉奇：《〈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序》，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3页

【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327页

【5】参见萨空了同名文章，载《中国出版史料》第一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340页

【6】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7】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

系总序》，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

【8】陈思和：《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9】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载《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143页

【10】1879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那夏礼博士在广州沙基同德大街创办“安和堂”，奠定培英的基础。1888年迁入芳村花地“听松园”，改名培英书院，1919年正式以培英中学命名。

【11】叶文心：《都市、大众和文化》，载《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姜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7页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493页



十五日，與衆人相見。既而初次審訊，故討敵僅三千來，其餘以逃竄各處之餉歸，乃先後通印四千。初不料此區區數千之遺糧，日使竟不輕而走，嗣銷全糧，不特爲盡糧界莫一糧固之基，且爲彼安者闢一廣莊之大道也。

廿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艦侵襲上海，本公司地點適在戰區以內，一月份份帳全數在印

據傳九月初一日「中華救災」，出版後奉社會人士之批評，未及一月，即已再版，是書雖不足謂爲集中國文物之大成，惟以圖片作較詳之選集今觀者，頗足稱爲出版界空前之工作。同時筆者亦已蒙電影寫版印刷，讀此書更爲精，故雖在戰後以及不景氣之狀況中，仍繼續持筆，故有之而致。

吾人本爲民族造軀之精神，彼此歌頌，分作，中國文化前途，實利賴之。至於由來，尚有關於讀者。

No. 1 February 15, 1926



胡江記 謝花堂 胡 士女堂 胡

上海北四川路友友印刷公司印行

先生與我友於山左齊魯，以事棲學交誼，因被
治印件事，彼此國談，時相會晤，頗覺其年少
有爲，因部延聘，共圖廣理職務，第十二期，
因被隨先生以事告退，主編一席，即以陳先生
承其乏。

寫版之印刷所一時尚未能接盤受業，故仍用舊版紙印刷，雖圖版紙比寫版之紙而奇昂數倍，然為保存一良友之一歷年信冊計，吾人乃不惜此重大之犧牲。

有年，且於鑒先生出發旅行時，亦曾獨資，駕輕就熟，自能勝任愉快，雖特讀者所，亦本公司所深慶得人者也。



伍联德

(1900~1972)

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良友》画报创办人，第1至4期主编

1954年至1968年在香港复刊《良友》画报

伍联德： “出版育民，印刷富国”

有关《良友》画报的往事必须从伍联德说起。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良友》画报。

1925年，闯入上海的伍联德只有二十五岁，如同千千万万到上海“捞世界”的底层小人物一样，他既无家学，又无“家底”，像浮萍一般没有根基，唯一特别的是他选择进入的不是上海的社团和帮派结构，也不是金融和商贸体系，而是出版印刷业。

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业的面貌，老出版人朱联保撰写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有最轮廓化的述及，编撰说明中称：“本书内容材料，空间以上海市区为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租界时起，至上海解放后私营书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止，所记

单位近六百家，主要的单位大致在内，然亦尚有少数中小单位因无甚材料可记而遗漏”；而1937年英文版《中国年鉴》里的统计，1936年全国新图书6185种，上海占5127种，达90%以上。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1932年在统计书业的营业情况时则说：“民国初年约一千万元，商务印书馆占十分之三至四，中华书局占十分一至二。近年约三千万元，商务印书馆约占二十分之六，中华书局约占二十分之三，世界书局约占二十分之一。”^{〔2〕}可见，上海的出版品涵盖了中国出版品的绝大多数，几大书局几乎揽下了出版业的半壁江山。

尽管上海显现了出版业的繁华，但从渊源上讲，出版业在中国的发展溯源不得不追及广东，“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嚆矢，当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期刊一部分供南洋华侨阅读，一部分送到广州，在广东知识分子圈内流传。1833年，传教士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计传》，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刊。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不但是中国人自出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在上海发行，自此以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上海。”^{〔3〕}

饶有趣味的是，此后在上海出版业中闯出一片“天地”的伍联德恰恰是广东人，而他的学问路途一直没有离开南洋华侨界。他自幼由伯父带领，从广州岭南大学^{〔4〕}附属小学读起，一直读完大学预科。

生于1900年的伍联德，系广东台山人，他父亲伍礼芬早年迫于生活困顿，随族人到美国纽约唐人街靠给人洗衣谋生，汇钱回来接济妻儿。伍联德读完大学预科后，因岭大未设本科，伍礼芬希望伍联德出洋深造。伍联德无意于此，据他回忆，他对印刷出版发生兴趣，是在岭大读书时，从该院图书馆看到进口的彩色印刷品的时候开始的。^{〔5〕}

预科期间，伍联德的英文功底不错，便与同学陈炳洪合译完了一本有关美术理论的书——《新绘学》，并投稿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十二

年（1923年8月）初版了此书，16开本，道林纸印刷，上下册分别为九十二页和一百三十一页，内有图多幅，另有彩图十六页，并由梁銓写序，汪兆铭题写书名。该书被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称为“图书教科书之善本”，岭南大学国画系主任梁銓在该书“序”中也称赞道：“现尚年少，常以发展西洋画学为己任。是诚不可多得之青年也。”

据说，两个年轻人拿了二三百元稿费，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游玩了一趟，还特地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去参观。

钟荣光校长知道伍联德有志于印刷出版业后，就亲自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写信，请张先生给予关照。张得知伍联德是商务印书馆所版图书的译者，便决定录用他。于是，伍联德于1924年进入商务编译所工作。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王云五根据伍的专长，安排他在图画股，编辑《儿童教育画》丛刊，伍在此先后工作了三年。其时，伍还在上海郇光学校兼任美术教员。他为商务编印的《儿童世界》书写美术字，颇受小读者的欢迎。他还设计了商务印书馆的馆标——C、P中间加一个“商”字，一直被“商务”沿用至1949年。伍联德在“商务”时期的工作虽有些成绩，但看起来并不美好，其间，据说他给王云五提过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

1925年7月，伍联德离开“商务”，和在“商务”图画股工作的同事莫澄斋（广西玉林人）一起



◎伍联德的父亲伍礼芬



◎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岭南大学香港各牧师